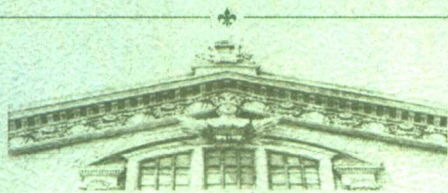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第二辑)



UNIVERSITY IN
TRANSFORMATION

转变中的大学

传统、议题与前景

TRADI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



郭为藩 / 著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SOUL OF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G649.1
15



UNIVERSITY IN
TRANSFORMATION

转变中的大学

传统、议题与前景

TRADI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



郭为藩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变中的大学:传统、议题与前景/郭为藩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

ISBN 7-301-10833-8

I. 转… II. 郭… III. 高等教育-教育史-西方国家 IV. G5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8931 号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台湾高等教育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转变中的大学:传统、议题与前景,郭为藩著,2004 年 10 月第一版,
ISBN 957-814-572-1

书 名:转变中的大学:传统、议题与前景

著作责任者:郭为藩 著

丛书策划:周雁翎

丛书主持:周志刚

责任编辑:马惊飙 闫春玲

标准书号:ISBN 7-301-10833-8/G·188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y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1.25 印张 167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



虽然在大学任教有 20 多年,对大学的历史发展却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去年从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借读剑桥大学近年出版的两套巨著,一为 H. De Ridder-Symoens 主编的《欧洲大学发展史》,另一为 Damien Riehl 等四位学者分别主编的《剑桥大学发展史》,很感兴趣地注意到欧洲传统大学有不少传统至今依然沿袭存在。虽然中世纪的大学与今日高等学府相比,规模上相差悬殊,但是在制度面却是一脉相承的;19 世纪前,大学规模普遍很小,即使到 1789 年,美国全部 9 所高等学府,学生总数也未逾千名。无论如何,大学与科举是世界文化史上两种最值得重视且历史悠久而存续迄今的制度,其影响于知识分子及学术兴衰也无与伦比,历史学家自有深刻的分析。

最近一年间密集阅览国外学者讨论高等教育革新的文献,特别是全球化对大学教育的冲击,猛然察觉到欧美大学正在进行一种“静默的革命”,是 19 世纪中期以来最巨幅的转变。这场全球化知识产业竞争带动的风潮,波涛汹涌,已波及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及中国大陆都在政策上采取积极因应策略,中国台湾自难例外。身为学术界的一分子,不能不将所知所觉,将当前大学面对的困境及今后演变的可能出路,尽早让有心改革教育及关心大学前途的学界人士参考。时间就是金钱,对主持大学校务发展与身负全国教育决策重任的人士而言,愈早掌握世界大势之所趋,愈能减少决策上误差的代价。笔者既已退休,能聊尽绵薄的“剩余价值”,为忙于公务而无暇阅读国外文献的行政阶层搜集参考资料,益己利人,善莫大焉,这正是撰述本书的动机。

美国高等教育在第二次大战后曾经有过 30 年的黄金时期,1945 年有高等教育机构 1768 所,学生 167 万人;到了 1975 年,高等教育机



构增至 2747 所,学生总数高达 1120 万人。中国台湾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扩充也迅速惊人。笔者离开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行政职务时,大专院校只有 60 所,而 7 年后(2003 学年度)却增加到 152 所,大学生人数也大约增加 3 倍,达 98 万人。高等教育大众化固然是可喜现象,问题是教育资源正在减少,连学生来源亦逐年因少子化而大幅降低,台湾地区大学面对的外来竞争愈来愈猛烈,而这些年来大学生单位教育费用却反而下降。今后台湾的高等教育要力争上游,提升竞争力,有待考虑的兴革策略很多,大学的经营规模就是其中之一,笔者参与推动师范院校的联合大学系统正基于此一动机。

本书讨论的几个主题,包括多校区大学系统、联合学位、公立大学法人化、大学评鉴与品质保证、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研究型大学与排行榜、网络教学与推广教育以及非传统学生与终身学习等都跟大学未来的调适及高等教育政策导向有关。本书也未忽略大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所以用相当篇幅讨论通识教育、学术自由、大学教师的学术责任、大学校长的任务、董事会的职能,并探讨网络普及后大学校园的深度变化。本书试图勾勒大学数百年来承袭的传统形式,当前见仁见智的论题与多姿多彩的风貌,以及今后十多年可能出现的前景,因而取“传统、议题与前景”为副书名。虽然内容有限,但是大学的转变脉络约略浮现,而书后所列西文参考书目相当充足,有胃口进一步探索的读者仍可按图索骥,就关注的题材细嚼。

本书除了第四章及第九章曾分别摘引笔者发表过的《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及《网络大学体制化的商榷》两篇文章的部分材料外,均系新作。完稿之时,适逢大学指定科目考试揭晓而入学登记即将开始的七月天,各校招生新招千奇百怪,让人目眩,不由自主地喊出:“时代变了,大学也变了。”只是心里总觉得很多值得珍惜的大学传统实不该变,否则大学的本质也将一齐流失,成为知识经济的产业机构而已。想到这里,衷心期盼人文思想的智慧继续照耀中文世界的大学校园。

郭唐信志

2004 年 9 月于台北

目 录



第一章 大学的历史发展	
——从传统到现代	(1)
第一节 大学制度的诞生	(1)
第二节 15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末期的大学发展	(7)
第三节 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的大学	(14)
第二章 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	(22)
第一节 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24)
第二节 综合大学	(29)
第三节 技术学院	(31)
第四节 开放性的高等教育	(33)
第三章 美国联合大学系统之探讨	(37)
第一节 多校区大学系统的性质	(37)
第二节 美国大学系统的类型	(39)
第三节 大学系统的组织架构与功能	(43)
第四节 美国大学系统的观察	(46)
第四章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49)
第一节 学术自由理念的孕育	(49)
第二节 学术自由的性质与范围	(54)
第三节 大学教师的社会责任	(57)
第四节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59)



第五章 大学校长的任务与其遴选	(64)
第一节 大学校长的角色	(65)
第二节 大学校长典型夙昔	(68)
第三节 大学校长的遴选	(72)
第六章 大学法人董事会的职能	(78)
第一节 美英传统大学的董事会	(79)
第二节 董事会的成员组成与职权	(82)
第三节 大学董事会的制衡机制	(86)
第四节 董事会运作的基本模式	(88)
第七章 大学评鉴、认可与品质保证	(92)
第一节 大学教育品质管制的方式	(93)
第二节 大学评鉴的主要指标	(97)
第三节 高等教育品质保证运动	(100)
第八章 大学通识教育与核心课程	(105)
第一节 大学通识教育的推展	(106)
第二节 人文器识与人文素养	(110)
第三节 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	(114)
第九章 电子时代的大学推广教育	(119)
第一节 大学校园里的非传统学生	(119)
第二节 大学网络教学的发展	(124)
第三节 远距教学与大学经营市场化	(128)
第十章 高等教育的政策导向	(132)
第一节 面对全球化的大学发展策略	(132)
第二节 高等教育的资源开发与经营企业化	(138)
第三节 蜕变中的校园文化及其出路	(145)
参考书目	(152)
索引	(163)



第一章 大学的历史发展

——从传统到现代



第一节 大学制度的诞生

一、大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欧洲地区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析后,进入到所谓黑暗时代。一方面是王侯封建势力的割据,另一方面从公元 312 年罗马皇帝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皈依基督教后,基督教在各地建教堂,并营造了全面性的教会体制。公元 445 年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 (Valentinian III) 且下令各地教会的主教接受罗马教廷的支配,所以基督教会体制在第五世纪罗马帝国衰败后接管了一部分政府的功能。因此整个漫长的中世纪,虽然帝国体系四分五裂,但是社会秩序仍然靠着各地区政治势力与教会的权威勉强维持着,尤其是罗马帝国所制定的法令规章多数仍被遵循。这种情形使得中世纪后期,特别是 12 世纪市镇兴起后,商贾新兴势力组织的“基尔特”(guild)会社,能够保障本身的权益,得到各地政治势力的尊重。大学的初期形成,显然是当时的学者受到基尔特功能的影响,察觉到“团结就是力量”,有组织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文化方面,黑暗时代虽然乏善可陈,不过第六世纪开始由圣本笃



修会领先在各地建立的修道院,坚守着文化薪传的角色。圣本笃修会会规强调“祈祷不忘工作”,修士与修女虽然过着与世隔绝的苦修生活,但在自立自足的生产工作外,普遍重视学术研究,手抄经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修道院也收藏典籍文献,使希腊罗马的人文薪火不至于熄灭。有些修道院也办有寺院学校以培养传教士,课程以拉丁文讲授。修道院通常设有终身职的院长(abba,英文是 abbot,原意为父亲),成为监督并经营这种修道院生活社区的大家长(修道院有土地,且雇有佃农,近似一种财产共有的小公社)。修道院里实施公决制,重要事务须经过院长主持的院会(council)会商意见(Green & Lewis, 1997: 168—170)。这种生活社区的组织形态对后来大学的发展形式,不无启示的作用。

罗马帝国早先在水陆交通上的经营,使得中世纪后期商业热络后商人得以游走四方,尤其是罗马帝国一向以市镇(通常有城堡)带动广大的农村,所以 12 世纪以后,超过 5 万人口的城市兴起,引导经济贸易的活络,也使旅游和结社得到便利。十字军的数度东征,使原先就不甘困守宫廷生活的骑士,得以走出生活圈,见识各地风土人情,尤其是开始对回教文明有所认识并刮目相看。当时阿拉伯人除了在中亚地区有商业活动外,也到了西班牙及北非地区。阿拉伯的医学、数学、星象及建筑都有相当的水准,知识的实用价值重燃西欧地区学者对学术研究的热忱。事实上到了 12 世纪,许多世俗化的市镇学校已在各地应运而生,指导年轻学子研读圣经及拉丁文文法、演说辩论并教授基本技能(Lerner, Meacham, & Burns, 1998: 336—347)。

大学一词的拉丁文“universitas”,原是借用自罗马法规,意思是“法人组织(corporation)”(Green & Lewis, 1997: 538—539; Palmero, 1958: 111)。田培林教授亦曾指出:“大学的本意只是‘学者的集团’或‘艺术的集团’,参加大学的人都是已有相当成就的学者,大学中并没有严格的教授或学生的身份。”(田培林,1976:538—539)

根据罗马司法体制对这种“法人组织”(拉丁文 corpora)的认定,必须符合五个条件:(1)至少有创始人三位以上。(2)其行动由多数决定。(3)由一首长或代表人对外处理有关会务。(4)其债务或财产系组织公有,不由个别成员负责。(5)整个法人财产的维持视同一个体,比照任何公民在拥有财产的身份上一样(Duryea, 2000: 12)。

无论是基尔特还是法人组织,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在性质上是一种结社,或者说是一种学术性的生活社区,并以基尔特形态存在,希望受到当地政治势力或教会体制的保护。当时的大学尚非一种机构(institution),至少在12、13世纪发展初期是如此。

二、博洛尼亚大学与巴黎大学的诞生

西洋教育史一般都认为最早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与巴黎两地的学者社区。不过早在11世纪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Salerno)已经有学者聚集。萨莱诺的地理位置处于基督教、阿拉伯、希腊、犹太四古文明的要冲,所以很早就有学者与年轻人集结在一起研习古希腊与阿拉伯的医术,虽然没有医学院的规模,却是当时传承知识的学苑(studium generale)(Perkin, 1997: 7)。

博洛尼亚大学与巴黎大学正式成形于何时?事实上很难以一个年代确认。如同前述,中古时代的大学基本上是一群学人的聚集,这些以追求知识为尚、本身也有学术专长的学者,通常为若干声望崇隆的大师级人物所吸引,从四面八方来相会,生活在一起切磋论辩学问。例如经院哲学大师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 1079—1144)就曾吸引数百学人群集巴黎,据称其听众一度多达5000人(Palmero, 1958: 101),确是盛况少见。巴黎的索邦(Sorbonne)在12世纪末期就因地利人和,聚集了很多学人,并于公元1170年成立基尔特的结社。公元1194年这些学人所在的学苑正式获得教皇的恩准,享有特别权益的保障(如免纳税、受当地政府保护、免受市民干扰之类)。公元1200年法兰克国王也颁予保护令。公元1229年巴黎大学曾因若干学者受到谋害而引起师生恐慌,不少人逃往巴黎不远的市镇,如奥尔良(Orleans)、兰斯(Reims)及昂热(Angers)。公元1231年教皇要求法王处置谋杀犯,并颁授大学权益章程(great charter of privileges),才使事件平息(Perkin, 1997: 6)。公元1245年巴黎大学选出校长(rector),成为一个学者自治的学术社区。大约在公元1257年法王路易九世的神父索邦(Jean de Sorbon)捐赠一栋房舍与土地给这些学者,使这个学术基尔特得免寄人篱下、租居民房,这房



舍就成为巴黎大学最早的校舍(12世纪时捐赠田地、产业予修道院或法人组织已成风气)。可见巴黎大学的创立以何年为准,颇难确定。

12世纪的意大利地区已有不少商业发达的城市,如威尼斯(Venice)、比萨(Pisa)、米兰(Milan)、佛罗伦萨(Florence)、那不勒斯(Naples)及热那亚(Genoa)等。由于地利之便,博洛尼亚也聚集了不少好学之士,以研习罗马帝国的法律及天主教教规为务。所以当地国王F. Barbarossa于公元1158年颁予这些学人社区以安居章程,教皇也于公元1291年颁授特别权益的保障(Perkin, 1997: 7)。一般认为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最早的大學。

巴黎与博洛尼亚两地学者的基尔特有别于一般商人的基尔特,主要在于他们是一种学术的生活社区(包括已具声望的学者跟随若干他们仰慕的大师,也有尚无声望的年轻人了解教会事务或神学相追随,两者均以教职人士为多)。这种社区或自有校舍(如巴黎大学),或租赁民房,皆须托荫于当地政治势力的庇护,原则上都要获得教皇的书面许可(类似今日的认可制),这样才可以享有一些权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治权。也就是说,生活社区里的事务由大学自行约束其成员,当地政府或市民不得加以干涉,这正是最原始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主。由于这些称为大学的生活社区具有法人组织身份,所以有权使用一种共同认证的印章(盖在封蜡上),以示其法律上的有效性。据文献所示,13世纪中期的巴黎大学曾获教皇赋予主持校务的大师使用印信的权益,以便代表大学对外签订协议文书。由此可见,13世纪的巴黎大学虽然还是学者与学生的生活社区,然而已渐渐具有机构的性质。而且由学者专注的学术领域来看,也约略可见后来欧洲传统大学采取的神学、哲学、法学及医学四个学院架构的迹象。其中巴黎大学在神学方面人才济济,大师级人物也不少,跟博洛尼亚大学以法学闻名(研究罗马帝国法律与教会规律)相比,各有特色。

三、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起源

巴黎大学到了13世纪中叶据说一度有7000学生之多,听课的大

部分是来自各地有心治学的年轻人。巴黎大学的模式也被移植到他地,例如法国南部的蒙波利埃(Montpellier)、图卢兹(Toulouse),西班牙地区的萨拉曼卡(Salamanca),以及意大利地区的那不勒斯(Naples)纷纷形成类似的雏形大学社区。其中在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英国地区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也在13世纪前期发展成形(Lerner, Meacham & Burns, 1998: 338—342)。

12世纪后期很多英国学者及有志于研究学问的年轻人都越过海峡到欧陆游学,尤其在巴黎者为数不少。到了公元1193年以后几年,英王与法王的交恶达到高峰,英王遂采取阻止英格兰的学子前往欧陆的措施,并号召在法国的英格兰学子回国。由于两地关系的恶化,当时英国学者渐转往牛津(Oxford)这个新市镇集结。据文献记载,从公元1190年至1209年,牛津一地住过大约70位学者,包括神学、文艺、法学及医学等方面的都有(Hackett, 1984: 37)。

牛津大学成为学者与学子讲学论道的学术社区应该是在13世纪初,不过要确定证明牛津具有大学身份或法人组织形态,却迟至公元1231年才有文献可考。但是在公元1216年已有资料显示,教皇授权林肯(Lincoln)地区主教任命其辖区的德·露西(Geoffrey de Lucy)为首任牛津大学住持(Chancellor,当时尚称不上是校长,应是教会驻校代表)(Hackett, 1984: 21)。

剑桥大学的诞生可说是由牛津大学分割出来的,而且也循巴黎大学的模式。公元1209年有一牛津大学的学者以暗箭杀害当地一个妇人,当地政府抓了两个学者,在国王约翰的许可下,以吊刑将之处决。此事引起牛津学人的恐慌,他们认为安全没有受到充分的保障,纷纷走离牛津,有一部分学者逃难到剑桥(Cambridge)另起炉灶,创立后来的剑桥大学。剑桥大学跟牛津大学一样,其学者的基尔特组织一直到公元1250年左右才被认可,但是在公元1231年前后剑桥也受到英王亨利三世颁予保护状。

牛津及剑桥两校在设校初期,与当地教会主教的关系相当良好,住持一职以牛津而言,自公元1214年起就由所归属的林肯主教区指派。11年后,剑桥亦由所属艾理主教(Bishop Ely)来指派。到了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初期,两校住持逐渐蜕除教会派驻代表的色彩,融入大学



的法人组织,正式成为一种学术主管(Duryea, 2000: 23)。到了15世纪中叶,住持的性质又有了变化,“chancellor”职务渐成为一种名义上的校长,通常不住在校区里,而且多非学者,只是由政治界名人出任,他们虽由大学推举出来,却无固定任期,实际校务系由副校长(vice-chancellor)主持(Duryea, 2000: 24)。这种英国大学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大学的“chancellor”职务目前仍然多由政界大佬(如卸任部长、首相或王室要员)出任,他们照样由教授及校友代表经选举程序产生,校长平日只是主持大典,真正在主管校务的乃是“vice-chancellor”。早期大英联邦海外属地的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也还维持此一渊源于15世纪的传统。

四、14、15 世纪的大学体制

中世纪后期欧洲地区的大学如雨后春笋,在各地萌蘖。据文献估计,公元1300年时有16所,1400年有38所,1500年时已达72所。这些学府虽规模不一,但皆置有一位校长(rector 或 chancellor),也有校印以对外签约,具有法人身份,可拥有校产。这些大学的教师分别隶属于文学、神学、法学及医学四个学院,学院多享有教皇颁敕保护令,不受当地政治势力之干扰或市民的侵害(Perkin, 1997: 10)。

在这些大学中值得重视的是日耳曼地区大学的成长。早在公元1347年就在目前捷克布拉格(Prague)地区由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Charles IV, King of Bohemia)成立了一所学苑,据称到了1400年来自外地的学者与求学的年轻人就多达两千名,到1419年这所学苑已蜕变成为一所基督教大学。在同一时期,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也于1385年诞生,随后科隆(Cologne)的大学于1388年、维尔茨堡(Würzburg)的大学于1402年成立。稍后尚有巴塞尔(Basel)于1432年、弗里堡(Fribourg)于1455年、美因兹(Mainz)于1476年、蒂宾根(Tübingen)于1477年分别产生。可见在14、15世纪的德、奥、匈、捷中欧地区文风鼎盛,与法语地区不遑多让。至于苏格兰地区,在1409、1450以及1494年也分别成立了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格拉斯哥(Glasgow)及阿伯丁(Aberdeen)大学。

大学制度的发展到了 14、15 世纪最值得重视的是学院 (college 或 faculty) 的形成。当时大学的成员除了具有声望的学者外,主要包括僧侣、教士以及一些托钵僧,即使是年轻的学生也多数志在教会生涯,到教会来研习教会法规相关学识;此外也有为研习罗马帝国商法、民法,或为医学等实用知识到大学听课。大学生起初租居民房,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大学渐渐拥有捐赠的房产,学生就住到学舍 (hostels),每个学舍通常置有一位具教师身份的学者担任舍监 (warden 或称 provost),有些大学甚至可聘用导师 (tutors) 来指导学舍里的学生。住在学舍里的多数为较年轻者,学者及年长学员仍住在校外,租赁民房,但分别属于一个学院,有些大学如剑桥大学尚指派教师会同市镇的公正人士组成小组,协助租约的协商或调解纠纷。

大学的法人身份开始时多依据教皇的敕令,到了后期,教会的约束力日渐松弛,权力逐渐移转到当地政治势力,所以王室所颁庇护功能的恩许状 (Royal charters) 成为大学自治性及法人性的基础。王室对大学的庇护不仅在确认其法人地位,赋予对外签订协议契约的权责,以及管理自身财产并使其成员受到安全保障,而且很多学舍也是由王室捐赠;尤其是 15 世纪以后,很多学院个别获得王室的庇护章程,使大学渐渐转化为学院的组合体。由于学院本来就是生活的社区,所以学院也供养学者衣食起居,早晚要履行共同祈祷的仪式,因而每位具教授身份的学者要依附于一个学院,各学院也由相关学者共同管理。有些学院为了答谢外界捐赠或为维持公共关系,也颁赠教会重要人士 (如主教) 或王室显要名誉荣衔,现代大学的荣誉博士 (honoris causa),就起源于 14、15 世纪 (Leader, 1988)。

第二节 15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末期的大学发展

一、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

很多历史学家将 16 世纪的开始看做是中世纪的结束。事实上,



起源于意大利地区而逐渐扩散到西欧、北欧地区,重视希腊古典文学、人文思想及艺术的文艺复兴运动,早已于15世纪中期发端,延续了两百年左右的薪火。文艺复兴不仅重燃当时学者及城市新兴阶级对古典艺文的热情,而且也掀起人文主义的思潮,使整个中世纪被遗忘了的人性尊严及现世生活再度受到关注,像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与米开朗琪罗(Ariosto Michelangelo, 1474—1153)的艺术创作,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的科学知识,驱散了中世纪黑暗时代残存的阴影,带动新时代巨轮转到早期现代的世界(early modern world)。

差不多同时罗马教会也发生变化,先是14世纪有相当长的时间教皇避居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Avignon),导致1378年到1417年间阿维尼翁教廷与罗马教廷的分立。在这时期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也盛极一时,基督教教条的桎梏与赦罪方式的世俗化,掀起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最先在德意志地区发难,英王亨利八世亦因离婚事件与教会闹翻;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为逃离教皇迫害,避居瑞士,也举起基督新教的大幡,其弟子诺克思(John Knox)将此一新教思想带到苏格兰。

宗教改革方兴未艾,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同时崛起,办学方面影响广阔的耶稣会(Jesuit Order)在当时西班牙贵族罗约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1)带动下成军。耶稣会除宣示对教廷效忠外,且广泛办理慈善与文化事业。红极一时的神学大师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也领导基督教人文思想运动,希望巩固教会势力,而当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则在德语地区受到许多大学的支持。伊拉斯谟生于鹿特丹,曾经在修道院苦读古典典籍,之后在巴黎大学进修,并赴牛津大学进修,可见与当时大学的渊源也很深厚,尤其是巴黎大学与牛津大学更是神学研修的重镇。由此可见,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大学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未扮演关键性角色,却在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中成为不同宗教派系的堡垒。从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结束,神圣罗马帝国与东欧地区的大学(包括这段时期新成立的大学),多数跟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有关联。据傅利霍甫(Willem Frijhoff)分析,当时与天主教会有关的大学约19所,路德教派有

15 所,加尔文教派则有 9 所(De Ridder-Symoens, 1996: 73)。由于神学为大学的主要课程,多数学生且为神职人员,所以大学卷入宗教教派的对立,势难避免。

值得重视的是到了 16 世纪,欧洲不少新城市虽然未设有大学,却存在教授年轻学子古典人文课程的学校(多数称为 *gymnasia academica* 或 *academies studia generalia*)。有些设立多时的大学,也有不少分割成两部分:大学之外,另有一部分在教授古典学科,提供入大学前的预修人文课程。这类学校后来演变成为很多欧洲国家的古典中学(*grammar schools*, *haute ecole*, *hochschule* 等),并且后来与大学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De Ridder-Symoens, 1996: 54)。

宗教改革对大学发展的另一影响是大学生人数减少。清教徒推动的宗教改革,其出发点在消除罗马教会系统(包括各地教会势力)的腐化与特权,也正因为特权逐渐被削除,原来具有神职的一部分学生,不得已离开大学(Perkin, 1997: 14; Ruegg, 1996: 5);加上培养神职人员原就是当时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大学课程的世俗化,相对减少了有意向教会生涯发展人士的求学动机。宗教改革对大学发展的积极贡献在课程方面。为了引经据典、了解教义,新教徒钻研古希腊典籍。所以除了熟悉流行于当时的拉丁文外,教会人士也乐于学习古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像伊拉斯谟,他就是通晓多种语文的神学者。即使是天主教会,神职人员也以研习古典语文为尚。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是开启近代史门扉的关键时期,17 世纪后期到 18 世纪的西欧地区,其学术界波涛汹涌,多姿多彩。以法国为例,在政治思想上有伏尔泰(Voltaire, 本名 Francois Marie Arouet, 1694—1778)、孟德斯鸠(Le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以及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等大思想家的出现,引发了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另一方面,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到东亚新航线的畅通,也改变了当时学术界人士的视野与世界观,醒悟到有广阔的新领域尚待开拓探索。在英国方面,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以及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等也分别在许多领域发挥震撼力。启蒙运动使当时大学课程中的经院哲学及绝对主义褪色,



连带使教会在大学的影响力减弱。相对的,各地的政治势力却取代了教会势力而导致学术研究的国家化倾向。中世纪原有的国际化特色,随学术领域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及神学在大学体系中不再“一院独大”的情势而改变。虽然18世纪的大学对新科学的引进,贡献非常有限,可是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却在政治势力的扶植下设立,例如法国地区成立了农业研究院(l'Académie d'Agriculture)、外科手术研究院(l'Académie de Chirurgie)、科学研究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以及医学研究院(l'Académie de Médecine)等(Hammerstein, 1996: 632)。虽然这些学院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裁并,但法国地区的研究风气显著受到鼓舞。除了这些研究院,尚有不少沙龙(salons)存在,是当时学者聚会论学的宠爱场所,这类机构在启蒙时代替代了大学的一部分角色。

二、表现突出的日耳曼大学

到15、16世纪之交,目前德国、奥地利、瑞士及东欧大部分的德语地区,已有相当数目的大学存在,包括布拉格大学(1347)、维也纳大学(1365)、爱尔福特大学(Erfurt, 1379,但到1804年停办)、海德堡大学(1385)、科隆大学(1388)、布达佩斯大学(1395,后来数度中断)、莱比锡大学(1409)、弗里堡大学(1457)、英格尔施达特大学(Ingelstadt, 1459,但1826年迁至慕尼黑)、蒂宾根大学(Tübingen, 1476)以及维滕贝格大学(Wittenberg, 1502,但1817年与哈雷大学合并)(De Ridder-Symoens, 1996: 81—84)。到17、18世纪,尚有若干新大学在德国诞生,其中以哈雷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 1693)与格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1733—1737)特别耀目。由于受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不少大学逐渐摆脱教会势力的左右。尤其在课程方面,面对新兴科学的出现,开始有相当开展性的做法。更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课程且以德语讲授,所以被学者视为近代大学革新的开端(田培林, 1976: 541—550)。

17世纪末的德国学术圈出现了两位重要的哲学家:一位是莱布尼

